

马克思恩格斯的中国预言及其当代启示

黄秋生,陈元^①

(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 基于欧洲早期学者们对中国的认知,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理论和东方社会理论,预测了中国革命的必然胜利、中国崛起的有效途径以及未来中国的可能地位,充分展现了经典作家的中国情结。毋庸置疑,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中国社会的预言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 马克思; 恩格斯; 中国预言; 中国梦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7)04-0033-05

马克思恩格斯并非欧洲中心论的忠实拥趸者,他们对东方社会的关注,特别是对中国问题的论述,既展现了其全球视野,又反映了其东方情结。正是通过古代中国文明的理性评价和近代中国社会的现实分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进行了预言。

一 马克思恩格斯中国预言的思想源流

马克思恩格斯的中国印象源起于欧洲早期先贤们的中国观。经典作家不仅理性分析了早期欧洲到访者和理性主义者眼中“世界文明典范”的“美好中国”,而且深入探讨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德国古典哲学家口中“守旧落后化身”的“停滞王朝”。

(一) 欧洲早期到访者的中国印象

西方对遥远中国的首次探寻源于13世纪意大利的旅行家和商人——马可·波罗。1271年11月,马可·波罗一行从威尼斯启程前往东方,1275年夏抵达中国元朝上都,1298年,在中国游历17年以后再次回到威尼斯并口述了《马可·波罗游记》。游记中,他盛赞中华文明的富足繁荣、文教昌盛,认为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典范与楷模^[1]。继马可·波罗之后,西方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于1582年再次来到中国澳门,开启了沟通近代中西方文明的伟大事业。此后,中华文明在欧洲迅速传播,以门多萨为代表的欧洲早期传教士更是将中国描绘为稳定繁荣的文明楷模、人类道德秩序的典范,在其早期著作《大

中华帝国史》中,门多萨对中国培养选拔官吏的方式热情地加以赞扬,他认为“通过学习儒家经典——举行科举考试进行选拔——皇帝张榜公布”这一做法有利于温和统治臣民。由此可见,自13世纪马可·波罗游历中国以来,西方传教士们建构了一个美好的“中国形象”。这种以崇敬心态认知中国的情形,反映了当时“大中华帝国”举世瞩目的世界地位。

(二) 欧洲早期理性主义的中国印象

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继早期传教士的美好中国印象后,欧洲早期理性主义者对中国的考究逐步升温。这一时期,德国客观唯心主义和唯理论哲学家莱布尼茨掀起了“中国热”的潮流。在《中国近事》一书中,莱布尼茨曾多次表达其对中国由衷的敬仰,他指出:“中国具有(在某方面令人敬佩的)公共道德。……虽然希腊拥有《圣经》这样最早的著述,但与他们相比,我们只是后来者。”^[2]谈及中国的文化与道德传统,莱布尼茨更是赞不绝口,他认为中国在协调公共生活及建立公共秩序方面,体现了难以用笔墨形容的大智慧和大逻辑。不难看出,处于启蒙早期的莱布尼茨把中国当成理性主义、人文主义的榜样,拥有积极、肯定的中国印象,认为中国在哲学、政治、道德实践上存在可学习和效法的非凡成就。显然,这一时期欧洲先贤们对中国的整体印象,凸显了当时东强西弱的世界格局。

(三)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中国印象

18世纪中后期,航海和经商贸的发展壮大打

[收稿日期] 2017-04-18

[基金项目] 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课题“马克思恩格斯的中国观及其对实现中国梦的启示”资助(编号: CX2016B458)

[作者简介] 黄秋生(1973-),男,湖南衡南人,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

^①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破了东强西弱世界格局。随着以英国为首的欧洲资本主义迅速崛起,曾经以“世界文明典范”著称的中国形象急转直下,“中国热”慢慢消退。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开始了对中国的批判,他们认为中国社会丧失了活力,人们的生活已经处于一种停滞不前的状态。《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指出以往中国市场确实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对自由贸易与市场的忽视,目前处于停滞状态的中国经济已难以匹及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受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中国观的影响,西方社会丑化中国的言论开始大行其道。当时美国一位海军军官就在他的航海日志中通过引述官吏商贾的行为,斥责传教士散布了不实之辞,他认为在中国并不存在值得效仿的道德及法律,中国的家庭也并非充满人性与善行的光辉^[3]。

(四)德国古典哲学家的中国印象

18 世纪末至 19 世上半叶,继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开启中国负面评判之后,德国古典哲学家进一步贬低了中国的形象。曾经推崇为处于哲人治理之下的中国社会,已被视为“一具涂了防腐香料的木乃伊”,曾经颂扬为“理性的完美体现”的中华帝国,被贬为“守旧落后的化身”。欧洲人对中国印象的跌落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家为盛。尽管在《历史哲学》中有长达 50 多页关于中国的描述,但黑格尔断言,对于中国历史,“我们用不着深入考究,因为这种历史本身既然没有表现出有何进展,只会阻碍我们历史的进步”^[4]。在黑格尔看来,中国根本就没有历史,中国人的历史只是一种既定的事实,而缺乏对事实的深入剖析与独到见解。之后谈及中国时,黑格尔更是认为当东方世界神秘的面纱被撩开之后,所谓的东方乐土不过是无稽之谈。由此可见,积极、美好的中国印象此时已经让位于负面、丑陋的中国形象。今天看来,从高度赞赏、充分肯定到负面贬斥、全面否定,西方人中国观的变迁恰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界重心的转换。

二 马克思恩格斯中国预言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中国的预言绝非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测,而是有其自身的理论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中国发展趋势的预判,总体而言立足于经典作家自己创立的唯物史观之上,具体来说生成于 3 大理论之中:一是洞察人类文明史的世界历史理论;二是总结人类社会发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

立足于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念,剖析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开始探求世界历史发展的演变规律。

历史哲学中,黑格尔极为深刻地把握到了世界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提出了“世界历史”的概念。他向世人宣称世界历史并非杂乱无章,而是在“绝对精神”支配下的规律性运动。之后,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继承了黑格尔对世界历史运动的规律性认知,辩证否定了其历史唯心论倾向,创立了新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完全是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5]540-541}他们认为,18 世纪 60 年代英国爆发的产业革命将文明国家与野蛮国家同时卷入了世界历史的洪流中,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5]40}而这一全球化浪潮恰恰又是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个前提条件,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只有在世界结为整体才能真正得以实现,置身于世界历史之外的狭隘的个人与民族是无法获得真正的解放的,所以马克思又说:“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象它的事业——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5]41}马克思秉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创新了世界历史理论,其理论不仅在于指出世界历史

的整体性,即各民族如何突破民族囚笼走向世界历史舞台,实现共同发展,而且明确揭示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舞台不断更替演变,其发展重心遵循着从东方到西方再到东方的社会运动规律。

(二)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形态理论

在世界历史理论的大图景下,通过对人类社会形态变迁的深入分析和社会基本矛盾的准确把握,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和社会形态的更替规律。

关于社会形态理论,马克思恩格斯着重强调了社会形态更替演变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特点。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所谓统一性,即人类社会历史的总进程,在历史必然性的制约下,呈现出一定的轨迹和趋势,始终遵循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

本主义社会逐一演进的脉络,这种社会形态的更替具有决定性。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5]592}就每一民族的具体历史而言,社会发展并非严格按照5种社会形态的序列依次更替,其具有多样性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人类社会的同一性并不否认不同民族、地区、国家可以在一定历史环境下实现跨越式发展。相反,历史的多样性可以使一个民族跨越一种或几种社会形态,通过不同的道路迈向较高级的社会形态。为了佐证这种多样性的存在,马克思恩格斯援引了西欧日耳曼民族、东欧斯拉夫民族和亚洲的蒙古族越过奴隶制,从原始社会直接走向封建社会的例子。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形态理论启示我们既要把握社会发展的总体运行轨迹,又要看到不同民族、地区和国家的发展特色,坚持线性发展与非线性发展的有机结合。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形态理论为其晚年对中国的设想提供了具体的理论依据,其社会形态理论表明中国未来的发展并不需要完全“遵循”西方社会发展的“逻辑”,只要中国人民能够认识到社会形态更替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就能走出不同于西方发展道路的中国特色之路。

(三) 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对东方世界的思考得益于摩尔根对史前社会史实的系统分析与整理。在《古代社会》中,摩尔根不仅佐证了“蒙昧时代”存在的事实,而且成功解决了早期氏族问题。这一论证成为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重新考究史前社会和东方社会的重要史料。

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思想并未集中论述,而是散见于马克思研究俄国、印度、中国等的文章之中。所谓的东方社会理论,是指马克思恩格斯以俄国、印度、中国等东方国家为研究典型,揭示其历史发展、现实状况及未来走向的理论。众所周知,在研究东方问题时,马克思恩格斯首先以俄国为观察对象,他们十分关注俄国社会的现实状况及未来命运。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对于俄国农村公社应通过何种新途径走向社会主义制度,曾四易信稿。恩格斯更是认识到东方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曲折性与艰难程度,在1894年《〈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一文中他写道:俄国的农村公社是否还能得到挽救,以致在一定的时刻……它能够同西欧的转变相配合而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这个问题我不能予以回

答”^[6]。这里恩格斯不能肯定说明的正是俄国社会发展道路,可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注定遍布荆棘,充满曲折。对于印度,马克思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他指出只有印度人民通过社会革命,才能收获西方列强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思想^{[5]861}。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表明经济落后的民族、地区及国家完全可以利用自身的后发优势,通过吸收人类先进文明成果,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成功实现后发国家的赶超。

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为其后探讨中国问题提供了一定的研究范式。经典作家认为,只要真正重视人类先进文明成果,充分利用后发优势,落后的东方中国还是能够实现民族的崛起和国家的富强的。

三 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中国社会的预言

自19世纪50年代开始,马克思恩格斯开始着手研究东方大国——中国。立足于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理论和东方社会理论,通过对古代中国的理性考察和近代中国的现实分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中国革命的必然胜利、中国崛起的有效途径以及未来中国的可能地位进行了科学预测。

(一) 中国革命的必然胜利

围绕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马克思恩格斯指明中国革命最后的结局必然是中国人民战胜西方殖民主义者。

18世纪60年代,第一产业革命开启了资本主义的海上殖民掠夺时代。之后,作为新兴海上霸主的英国,先后于1840年和1856年因鸦片贸易向中国发起了两次侵略战争。这一时期,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密切关注着遥远东方的战况,在深入了解英国的对华政策之后,相继撰写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波斯和中国》《新的对华战争》等通讯稿,他们不仅高度赞扬和肯定了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正义性,并对中国革命趋势作了科学预言。一方面,两位伟人认为虽然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是这次战争却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提供了必要的实践经验;另一方面,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一文中,两位伟人指出,“两级相联”是否就是这样一个普遍的原则姑且不论,中国革命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却是这个原则的一个明显例证^{[5]778}。正因为如此,随着资产阶级的的发展,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的日益消

失^{[5]419},中国的革命火星将在整个欧洲和东方大陆掀起燎原之势,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推翻资本主义的殖民统治,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

(二) 中国崛起的有效途径

晚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对中国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作了全面剖析之后,对中国未来发展路径寄予厚望。

关于未来中国的走向,他们指出,“未来中国的命运必须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中;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势力能充当中国的‘拯救者’和‘保护人’”^{[7]10}。那么,中国人该怎样掌握自己的命运呢?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为地隔绝于世”的政策只会打垮“一个人口几乎占全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7]70}。相反,对外开放则能助力这个帝国重获生机。正如他们在东方社会理论中所说,无论是俄国还是中国,整个东方社会,“从理论上说”,都可能走上一条新式的社会发展道路,即东方的农村公社能够存在和发展下去,并成为东方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和出发点。“从历史的观点看”,东方的农村公社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同时存在,而且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正经历着危机,面临着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前景,东方社会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成果^[8]。基于以上判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预言,未来中国也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在开放中吸收人类先进文明成果,从而实现中国的崛起。

(三) 中国未来的可能地位

为了对中国有一个全方位的把握,马克思恩格斯曾从古代、近代、未来3个历史维度对中国的地位进行了判断与分析,他们指出农耕文明的古代中国属于“早熟的文明小孩”,封闭保守的近代中国则代表了“停滞的生产方式和停滞的社会生活”,那么,未来中国将以何种姿态出场呢?马克思、恩格斯在对未来中国的可能地位进行了分析之后,作出了预判,他们认为未来中国将会让世人“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马克思恩格斯眼中的未来中国既不是昔日旧中国的简单复制,也不是近代中国的克隆版,未来中国将从沉睡中被唤醒,其地位将会有一个大翻转,他们指出,“未来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就像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一样。……当我们的欧洲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在亚洲逃难,达到万里长城,达到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的时候,他们说不定会看见上面写着:中华共和国 自由、平等、博爱”^[9]。基于以上分析与判断,马克思恩格斯预测未来中国将

担任救世主角色,救世界于水火,实现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发展。由此观之,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中国地位的预估与判断始终持肯定、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未来中国只要善于抓住历史机遇,敢于做时代的弄潮儿,主动迎难而上,其将以中国声音传达中国智慧展现中国新形象,引领新世纪潮流。

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中国的判断与分析,既有别于早期欧洲学者的盲目崇拜,又异于近代西方哲人的全面否定,其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未来中国的发展作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充分体现了经典作家的全球视野和东方情结。

四 马克思恩格斯中国预言的当代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的中国观深刻揭示了未来中国“传承古代文明”、“融入世界交往”、“把握后发优势”的重要性,其预言不仅展现了经典作家的世界眼光和中国情结,而且无疑对未来中国弘扬民族精神、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中国奇迹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启示。

(一) 继承弘扬民族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人类四大文明古国,唯有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绵延不断,究其根本在于中国母体孕育的民族脊梁——中华民族精神。马克思恩格斯在考究近代中国革命发展势头的时候,曾高度赞赏了中国人民熠熠生辉的民族精神。他们认为中国人骨子里存在的民族精神,使中国注定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出场形态。在《波斯和中国》一文中,两位伟人更是以波斯和中国为例,详细阐述了这种民族精神。他们指出中国与波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民族,波斯缺乏抵抗,最后沦为他人刀俎上的鱼肉,而中国则不同,中国人敢于拿起刺刀反抗,“在中国……民众积极地而且是狂热地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5]797},凭借这股精气神,中国人实现了绝地反击,保存了民族、国家和个人。对于未来,马克思恩格斯预言:“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5]800}由此可见,当代中国的发展,只有承袭先辈敢于反抗、不向外敌低头的民族精神,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二) 积极引领全球化浪潮,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打开国门,从闭塞走向开放,主动参与世界交往,是中国适应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顺则强大、兴盛,逆则淘汰、灭亡。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使中国错失了继续引领全球化浪潮的良机,造成了中国国际地位的下滑。对此,两位伟人曾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一文中多次予以讥讽,他们指出:“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5]781}那么,未来中国如何才能实现凤凰涅槃呢?马克思恩格斯在对东西方发展历史作了比较分析之后,强调未来中国在吸收西方优秀文明成果的同时,不能照搬其发展模式,他们认为,中国走殖民扩张的崛起之道,只会使革命成果白白葬送。因此,面对当今全球化的浪潮,中国唯有坚定自身道路,主动参与世界交往,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实现持久发展。

(三)努力发挥后发优势,创造中国奇迹

抓住契机,把握后发优势,这是中国创造奇迹的关键扼要。马克思恩格斯曾预言后起之秀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成为未来世界发展的导向标。那么,经济落后的中国怎样才能在未来的发展中摆脱资本主义长期以来的禁锢呢?马克思恩格斯启发每个中国人去思考以下3个问题:中国是否存在后发优势?中国为什么有后发优势?中国如何利用这种优势创造奇迹?首先,可以明确的是,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虽然无法在经济上拔得头筹,但是在经济发展条件方面却有着天然的优势。这种优势既不是欧洲优势也不是美洲优势,而是中国人自己特有的后发优势。那么,中国人这种后发优势源于何处呢?从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

的后发优势来自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达工业体系。众所周知,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为经济落后的民族、地区、人民提供了诸多经验与教训,凭借这些经验与教训,中国足以减轻早期资本主义生产的阵痛,在短时间内取得较大发展。除此之外,我们还应注意到中国固然存在后发优势,但倘若这种优势无法有效利用起来,那么,中国的发展也难以实现新的突破。为此,当代中国只有努力寻找机遇,发挥后发优势,才能开启人类新纪元,创造中国奇迹。

[参考文献]

- [1] 武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1104-1120.
- [2] 秦家懿.德国哲学家论中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72.
- [3] [英]乔治·安森.1704—1744 环球航行[M].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74:366.
- [4]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112.
-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10.
- [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71.
-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6-278.

Marx and Engels Chinese Prophecy and its Contemporary Inspiration

HUANG Qiu-sheng, CHEN Yuan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early European scholars' cognitive about China, Marx and Engels utilized their theory of world history, social theory and the theory of oriental society, predicted the inevitable victory about China revolution, the effective way of China rising and China's possible status in future, fully demonstrated the Chinese complex of classic writers. There is no doubt that Marx and Engels's view about Chinese future speculation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to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Marx; Engels; Chinese prophecy; The Chinese Dream